

华夏文库
科技书系

瘟疫来了 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韩毅 著



大地传媒 中州古籍出版社

华夏文库·科技书系

瘟疫来了

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韩毅 著

大地传媒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瘟疫来了: 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 韩毅著.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7.11

(华夏文库科技书系)

ISBN 978-7-5348-7458-1

I. ①瘟… II. ①韩… III. ①传染病防治—医学史—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R1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86570号

华夏文库·科技书系

瘟疫来了: 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总 策 划 耿相新 郭孟良

项目协调 单占生

项目执行 萧 红

责任编辑 赵建新

责任校对 王东升

封面设计 新海岸设计中心

版式设计 曾晶晶

美术编辑 王 歌

出 版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编: 450002

电话: 0371-6578869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毫米×640毫米 1 / 16

印 张 12.5印张

字 数 151千字

印 数 1-2000册

定 价 31.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华夏文库》发凡

毫无疑问，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精神追求、文化叩问与出版理想。我们不禁要问，在 21 世纪初叶，在全球文明交融的今天，在信息文明的发轫初期，作为一个中国出版人，我们正在或者将要追求什么？我们能够成就或奉献什么？我们以何种方式参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进程？在一连串的追问下，于是，有了这套《华夏文库》的出版。

自信才能交融。世界各大文明在坚守自身文化个性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加快了探视其他文化精神内涵的步伐，世界不同文明正在朝着了解、交流、碰撞、借鉴与融合的方向前进。在此背景下，建立自身的文化自信，正是与世界各文明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基本要求。五千年中华文明与文化正在不断地被其他文明所发现、所挖掘、所认知，汉语言正在生长为世界语言，儒文化正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

借助这样一种正在成长着的文化自信、自觉、开放、亲和之力，用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眼光全面系统梳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与文化，向其他各大文明与文化圈正面展示自我，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我们出版这套文库的目的之一。此其一。

知己才能知彼。身处五千年文化浸润的今天，重新思考我们先人的人生思考、价值思考与哲学思考，找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价值

所在、立命所在、安身所在，这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人与出版人不得不再思考的问题。作为中华文明的一分子，我们在思考的同时，还必须了解我们的先人创造了如何优秀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以及社会文明。只有熟知自己的文化，热爱自己的文化，悟明自己的文化，我们才能宣说自己、弘扬自己、光大自己。因此，我们策划组织这套《华夏文库》的初衷，还在于让当下的知识青年全面系统瞭望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全景，并借此能够对更为深广的世界各民族文化提供一个比较认知的基础。此其二。

顺势才能有为。我们正处在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交汇处，信息文明带领我们从读纸时代进入读屏时代，以智能手机屏幕为代表的书籍呈现方式正在与纸质书籍争夺阅读时间与空间。我们正在领悟数字技术，正在以信息文明的视角，去整理、分析和研究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为了唤醒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还在生发和原创着当今时代的文化。由此，我们试图架起一座桥梁——由纸质呈现而数字呈现，由数字呈现而纸质呈现，以多媒介的书籍呈现方式，将文字、图像、声音与视频四者结合，共同筑成《华夏文库》以奉献给信息文明时代的新读者。此其三。

总之，这是一套——专家大家名家写小书；以最小的阅读单元，原创撰写中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与社会文明系列主题与专题；以图文、音视频多媒介呈现的方式，全面介绍与传播中华文明与优秀文化，系统普及与推介中华文明与文化知识；主旨是为了让世界与中国共同了解中国的——大型丛书。借此，复兴文化，唤起精神，融入世界。

耿相新

2013年6月27日

目 录

一 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重大影响

- 1 宋代瘟疫的种类、流行与传播情况2
- 2 宋代瘟疫分布的特点及其变化10
- 3 瘟疫流行对宋代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13

二 宋代政府建立的疫病防治体系

- 1 宋代皇帝和政府对于瘟疫的认识及其转变21
- 2 宋代官修医学著作对疫病病因、病症及
传染性的解释28
- 3 宋代政府对瘟疫的态度与国家防疫体系的建立35

三 宋代政府防治瘟疫的措施

- 1 宋代政府防治诸路州县瘟疫的措施42
- 2 宋代政府防治军中瘟疫的措施58
- 3 宋代地方官吏防治瘟疫的措施77
- 4 宋代政府防治瘟疫的特点98

四 宋代医学家防治瘟疫的措施

- 1 宋代医学家对瘟疫的认识和防治102
- 2 宋代医学家提倡的防疫之法143
- 3 宋代医学家防治瘟疫的特点149

五 宋代宗教人士和普通民众防治瘟疫的措施

- 1 宋代宗教人士对瘟疫的救治152
- 2 宋代普通民众对瘟疫的认识和反应155
- 3 宋代宗教人士和普通民众防治瘟疫的特点164

六 宋代社会防治瘟疫的历史借鉴

1 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	166
2 宋代社会防治瘟疫的历史借鉴	173
3 宋代社会防治瘟疫的局限	182
参考文献	184
后记	189

一 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重大影响

瘟疫的形成与传播，给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带来深刻的影响。疫病不仅能够毁灭个体的生命，而且还影响或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每一次重大疫病的流行，几乎都会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破坏，人口死亡，土地荒芜，灾民迁徙，盗贼逢起，等等，使政府面临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同时，疫病流行次数的增加、流行范围的扩大、新病种的出现及其带来的高死亡率，促使国家政府建立卫生防疫体系，促使医学家关注疫病成因和研制防疫药物，促使普通民众应用医学知识防治疫病。

宋代是中国古代疫病频发的时期，无论从发生频率、时空分布，或者疫病种类、社会反应层面，都有一种不同于前代的特征，显示出两宋时期中国古代国家在疫病的认识和应对方面具有相当的组织能力和活力。

1 宋代瘟疫的种类、 流行与传播情况

宋代瘟疫的名称有疫、疾疫、疫疠、大疫等，一般统称为疫病。按官修医学方书《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方》《简要济众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政和圣济总录》等分类，其种类主要有疾疫、伤寒病、时气病、天行温疫、痢疾、大风癩疾、疔腮病、痘疮病、麻疹、黄肿病和癆瘵病等，尤其是瘧疫成为南方地区流行最广泛的一种疾病。

依据宋代历史文献、医学文献和方志文献的记载，宋朝境内约发生了 293 次瘟疫，其中北宋约 149 次，南宋约 144 次。此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疫病，辽朝约 1 次，吐蕃约 2 次，金朝约 9 次，蒙古约 6 次，合计两宋时期中国境内约发生了 311 次较为严重的疫病。这些疫病具有明确的发病机制和流行过程，对宋代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

[1] 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11 ~ 133 页。

疾疫，宋代流行最广泛的传染病

疾疫即流行性的传染病，具有发病急骤、传染性强、病情危重凶险且死亡率高等特点。宋代时，大规模的疾疫约发生了167次，其中北宋时期约发生78次，南宋时期约发生89次。如淳化三年（992）五月，京师开封大热，瘟疫流行，死者甚众。嘉祐五年（1060）五月，开封发生地震，随即瘟疫爆发，加之贫民为庸医所误，死亡者甚多，著名文学家梅尧臣（1002～1060）就在此次瘟疫中染病而亡。元祐五年（1090），自春至夏、秋，淮南西路蕲州、黄州人患急喉闭病，十死八九，速者半日、一日而死。

隆兴元年（1163）四月至隆兴二年（1164）十一月，南宋政府举行了“隆兴北伐”，两淮地区经金朝军队入侵和战争蹂躏，流移之民饥寒暴露，渐有疾疫形成。冬天，淮南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1]。更为严重的是，两浙东、西路发生水灾，这些进入浙江的流民又将疾疫传染给了江南民众，“时水旱之余，疾疫大作，道殣相属”^[2]，造成了“浙之饥民疫者尤众”的惨状。直到乾道元年（1165）六月，疫病还在两浙路临安府（治今浙江杭州）、绍兴府（治今浙江绍兴）和归安县（治今浙江湖州）一带流行。如乾道元年（1165），“行都及绍兴府饥，民大疫，浙东、西亦如之”^[3]，“北关门外民户流移疾疫五万余人”^[4]。常州、

[1] [元]脱脱等：《宋史》卷62《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70页。

[2] [宋]汪应辰：《汪文定公集》卷12《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清抄本，《宋集珍本丛刊》第46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118～121页。

[3] [元]脱脱等：《宋史》卷62《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71页。

[4] [明]黄淮、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246《荒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8页。

湖州“大疫作，饥殍徙者不可甚计”^[1]。乌程、归安县寒、水、饥、疫，六月水坏圩田，“大疫，大饥殍，徙者不可胜计”^[2]。此次江南疫病大流行，造成约一半以上的人口死亡。

宋代，从国外传入的传染性疾病主要有“时疫疙瘩肿毒病”。据金朝正隆年间杨公集《拯济方》记载，该病“生于岭北，次于太原，后于燕蓟，山野颇罹此患，至今不绝，互相传染，多至死亡”^[3]，大致在金熙宗天眷、皇统年间（1138～1149）传入中国。此病在黄河下游、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多次爆发，如皇统年间（1141～1149）河东大疫、天德年间（1149～1153）河北大疫、泰和二年（1202）济源大疫、天兴年间（1232～1234）汴京大疫等，造成宋金民众大量死亡。据该病的症状和从蒙古高原传入华北平原的路线来看，该病可能为宋金时期新出现的“大头天行病”或“鼠疫”，具有强烈的传染性，死亡率极高，以致明代称此病为“大头瘟”或“大头伤寒病”。现代医学史界称此病为“腺鼠疫”^[4]，是一种新型的传染病。

自然灾害引发的疫病在宋代多次发生和流行

宋代文献中直接用“水疫”“震疫”“旱疫”“火疫”“饥疫”等名称来称呼这类疾病，其约发生 63 次，其中北宋时期约发生 38 次，南宋时期约发生 25 次。

如明道二年（1033）春二月，全国出现持续的大旱，继又引发疫

[1] [清]宗源翰修，[清]周学浚、陆心源等纂：《同治湖州府志》卷 44《前事略·祥异》，同治十三年爱山书院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辑》，上海：上海书店 1993 年影印本，第 2～3 页。

[2] [清]李昱修，[清]陆心源等纂：《光绪归安县志》卷 27《前事略·祥异》，清光绪八年刻本，第 4 页。

[3] [明]朱橚：《普济方》卷 279《诸疮肿门·肿毒》，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21 页。

[4] 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2 页。

病流行。先是南方大旱，粮食短缺，饥民随即向州县城镇和其他富庶地区流动，但不幸瘟疫发生，死者十之二三。地方政府虽做粥糜以救济，“然得食辄死，村聚墟里几为之空”^[1]。六月，陕西路发生蝗灾和大旱，继又瘟疫流行，关中地区最为严重。九月，梓州路发生大旱和疫灾。熙宁八年（1075）夏，两浙路吴越大旱，接着发生大饥疫，死者过半。

庆元元年（1195）夏，临安发生严重火灾，引起瘟疫爆发，宋人称其为“火疫”^[2]。疫病随即传播到临近州县，浙西如湖州、秀州、常州、润州，浙东如庆元府、绍兴府，“自今疾疫颇盛，其他州县亦多有之”。湖、常、秀三州，“自春初夏，疫病大作，湖州尤甚，独五月稍宁，六月复然”^[3]。平江（治今江苏苏州）城中“疫病大作”，常州“疫气大作，民病者十室而九”。加之雨灾等其他灾害，此次疫病一直持续到庆元五年（1199）。

战争引发的疫病大量增多

宋辽、宋夏、宋交（趾）、宋蕃、宋金、宋蒙（元）之间多次发生战争，使得军中和边境地区疫病流行的次数超越了前代，约有21次，其中北宋时期约发生11次，南宋时期约发生10次。

开宝二年（969）闰五月，宋军在统一北汉太原（治今山西太原）的战争中受阻，围城部队“多被腹疾”^[4]。从太常博士李光赞《上太祖谏伐河东乞班师》奏来看，闰五月“时属炎蒸，候当暑雨，傥或河

[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05页。

[2] [元]脱脱等：《宋史》卷62《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71页。

[3] [宋]侯君素：《旌异记》，[元]陶宗仪编：《说郛三种》卷1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430页。

[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42页。

津泛滥，道路阻艰”，是此次围城士兵发生疫病的根本原因。从时令来看，这次军中大疫可能为痢疾。

靖康元年至二年（1126～1127），金朝发动侵宋战争，造成开封瘟疫大流行，“以故数大疫，死者过半”^[1]。如果记载准确的话，当时约100万人口的开封，大约有50余万人死于疫病，死亡率之高，令人触目惊心。开封瘟疫究竟是何种传染病，史书记载较为简略，但从时令和死亡人口数字来看，可能为斑疹伤寒或鼠疫之类的疫病。这次由战争引发的瘟疫，同样也祸及南侵的金军。金兵渡河、渡淮、渡江引起的人口南迁，引发靖康、建炎、绍兴、隆兴初年黄河下游、淮河下游、长江下游疫病的大流行。

蒙古伐金、伐宋时，伤寒病、瘴疫等时常在军中流行。如德祐元年（1275）六月庚子，成都府路嘉定、三龟、九顶、紫云四城民众迁徙，流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天宁寺死者尤多，一直到德祐二年（1276）闰三月，城中疫气熏蒸，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数计。祥兴元年（1278）八月，文天祥（1236～1283）率军进入广东抵抗元军，军中瘟疫发作，兵士死者数百人。文天祥惟一子，与其母皆死。

开封和临安成为全国疫病高发的地区

宋代特殊的驻军制度使北宋首都开封和南宋行在临安成为全国疫病高发的地区之一，其中开封府界约发生了17次传染性较强的疾病，两浙东、西路约发生了55次传染性较强的疾病。北宋建都汴京，因四处无险可守，在京畿地区驻守了全国一半的禁军，这为军中疫病的

[1]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96《靖康中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11页。

流行提供了条件。如：淳化三年（992）五月，都城大疫。淳化五年（994）六月，京师疫。咸平六年（1003）五月，京城疫。景祐五年（1038），京师疫。至和元年（1054）春正月，京师大疫，祥符县疫。嘉祐五年（1060），京师大疫。元祐八年（1093）五月，京城疾疫。绍圣元年（1094），京师疫。宣和二年（1120）五月，京师大疫，太学诸生多感疾。靖康二年（1127）春，京师大疫。

南宋建立后，两浙路杭州及沿江一带屯驻大军，成为全国瘟疫流行的高发区。如：绍兴十二年（1142），杭州疫。绍兴十六年（1146）夏，行都疫。绍兴二十五年（1155）冬十月，杭州时气病流行。绍兴二十六年（1156）夏，行都又疫。乾道元年（1165），两浙西路临安府及绍兴府，民饥，大疫。淳熙八年（1181）夏四月，临安大疫，禁旅多死。淳熙十四年（1187）春，都民、禁旅大疫，浙西郡国亦疫。庆元元年（1195）夏四月，行都疫。庆元三年（1197）三月，行都及淮、浙郡县疫。庆元五年（1199）三月，杭州久雨，民多疫。嘉泰三年（1203）五月，行都疫。嘉定二年（1209）夏四月，京城疫。嘉定三年（1210）夏四月，临安大疫，都民、士兵病死者甚多。嘉定四年（1211）三月，杭州疫。

瘴疫成为南方地区发生最频繁的流行病

宋朝对南方地区的开发和拓边活动，使得瘴疫多次发生和流行，规模较大者约有 29 次，其中北宋时期约发生 17 次，南宋时期约发生 12 次。其高死亡率给宋人造成极大的恐惧，人们称岭南之地为“大法场”“小法场”和“人间地狱”，多不愿前往做官。

太平兴国五年至六年（980～981），北宋军队远征交趾，其地炎瘴，

士卒死者十之二三。皇祐三年（1051）五月，南方州军连年暴发疫疾、瘴疔，有的州病死者达十余万人。熙宁八年至九年（1075 ~ 1076），交趾大举侵犯广南西路诸州，由于前往征讨的宋军是中原人，不习水土，在广西境内引发瘴疫流行，十万大军因瘴疔腹疾而死者十之八九。

南宋淳熙七年（1180）夏四月至六月，成都府路黎州（治今四川汉源）少数民族叛乱，南宋军队奉命平叛。宋军在平叛过程中，因瘴疫流行，死者不计其数。

人类不合理的生活方式所引发的疫病逐渐增多

这是宋代出现的一个新变化。如淳熙五年（1178）八月，两浙东路宁海县（治今浙江宁海）发生的疫病则是因当地人食用海鳗所致。咸淳六年（1270）发生在杭州的疾疫，则完全是由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干办内东门司、提点御酒库刘公正“洗马”污染水源而致。

除上述疫病外，宋代还有一些传染性和流行性的疾病，如水痘、虚劳（即黑热病）、风痧（即风疹）、喉痹病（即白喉）等。跟前代相比，宋代官、私医学著作对疫病的名称、病因、病理和病症等描述极为详尽，说明宋代已认识到普通疾病和传染性疾病的不同。虽然疫病的病名大多继承了古代医学经典，但宋代对疫病病因、病理和治法的解释，有了不少的创新。按现代传染病流行病学的分类来看，宋代瘟疫名称的含义较为广泛，既包括烈性传染病，又包括地方流行病等，是各类传染病的总称。

总之，宋代明确提出了“凡一岁之中，长幼疾状多相似者，此名

瘟疫”^[1]的概念。更为重要的是，宋代官修医书关于瘟疫概念、症状的规范与统一，以及医学家朱肱关于瘟疫与伤寒“其治法不同，所施寒热温凉之剂亦异”^[2]的见解，郭雍关于瘟疫四时有之、患者病症相同、以及“自感自致之病”^[3]的观点，突破了以往用伤寒论学说解释瘟疫的观点，建立了一种新型的解釋疫病成因的学说，因而发展了古代传染病的理论。

[1] [宋]陈自明：《管见大全良方》卷3《瘟疫证治》，胡国臣总主编，盛维忠主编：《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陈自明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2] [宋]朱肱：《南阳活人书》卷6，胡国臣总主编，田思胜主编：《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朱肱庞安时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3] [宋]郭雍：《仲景伤寒补亡论》卷18《伤寒瘟疫论一条》，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141～142页。